

# 中国古代象棋诗词述略

刘斌<sup>1</sup>

摘要：本文系统梳理历代象棋诗词的创作情况，赏析象棋诗词的优秀之作，挖掘其文学内涵，阐释其文化意蕴。并结合诗人的生平深入分析这些象棋诗词作者的创作心态。深入探析传世的象棋诗词在艺术上的不足，并从象棋自身特征和古代文人“贵弈贱象”的心态来揭示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社会原因与文化原因。

关键词：象棋；诗词；文化价值。

象棋是中国传统智力游戏，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有着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前，象棋文化研究的力度远不如围棋，在棋史类研究方面尤其明显。而象棋诗词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目前尚未出现有影响力的论文，更没有相关著作。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术界对象棋文化重视不够之外，古代象棋诗词自身特点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本文拟将中国古代象棋诗词作一番系统梳理，总结其中的优劣得失，以就教于业内专家与广大象棋爱好者。

## 一、象棋诗词创作概况

关于象棋起源的问题在学术界有各种争论。仅就目前所见的文献而言，关于象棋“发明权”的不同说法就有神农制作说（[元]释念常《续藏经·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黄帝制作说（[宋]晁补之《广象戏图序》）、周武王制作说（[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六）、北周武帝制作说（[唐]令狐德棻《周书》卷五及《北史》卷十）等，再加上民间流传的韩信发明说、蒯彻发明说等。在关于象棋起源的问题中，《楚辞·招魂》中的诗句常被引为例证：“崑蔽象棋，有六簿些。”然而联系后面的句子“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不难看出，这里的“象棋”显然与今天的象棋不是同一物件。《文选》六臣注中所说的“象牙棋妙且好也”亦可证明。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对此说得更为明白：“所云‘象棋’，乃是以象牙为棋子，非今之所谓象戏也。”

既然《楚辞》中关于“象棋”的描写与现今的象棋并无必然联系，故而不能将之视为象棋诗词的源头。两汉、魏晋亦无描写象棋的诗词。可见，象棋诗词的源头应是唐人的咏象戏之作。不过，我们今天几乎见不到整首专门描写象棋的唐

<sup>1</sup> 作者简介：刘斌（1977-），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九三学社社员，围棋一级裁判、武术一级裁判。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围棋文化、古琴文化、武术文化、金庸小说、汉族传统服饰等。著有《侠骨文心论剑时——金庸小说教你传统文化》《唐宋文人与围棋》（合著）《围棋文化百问》《<海错图>译注》。

诗，唐人对象棋的描写也仅仅是有句无篇，如白居易的《和春深二十首（其十七）》中关于象棋的描写：

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  
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  
兵冲象戏车，鼓应投壶马。  
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

诗中将象棋和围棋、投壶、弹棋等放在一起描写，真正描写象棋的只有一句，但可视为象棋诗词的萌芽之作。李松福先生在《象棋史话》中认为唐代李端的《哭张南史因寄南史侄叔宗》一诗中也有象棋描写，但这种认知是建立在对史料误读曲解基础上的，已被张如安先生用严密的推论所否定，资不赘述<sup>2</sup>。

整首描写象棋的诗词出现于宋朝，但为数不多，目前可见的主要有梅尧臣的《象戏》、程颢的《象戏》、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宫词》、刘克庄的《象棋一首呈叶潜仲》、文天祥的《象奕各有等级四绝品四人高下》以及吕渭老的《选冠子》、蔡伸的《临江仙》等。

明清两朝的象棋诗词也颇有佳作，明代象棋诗词代表作有明仁宗朱高炽和状元曾棨的《咏象棋》、毛伯温的《咏象棋》、唐寅的《言怀二首（其一）》、宋登春的《赠买药焦老善弈》、杨慎的《咏棋诗》、钱鹤滩的《吊棋》、李开先的《咏象棋》《戏赠棋子吴橘隐》《村翁》等。清代的象棋诗词代表作有刘墉的《咏象棋》、纪昀的《咏象棋》、李调元的《象戏》、张问陶的《观象棋乙卯八月戏作》以及袁枚的《吴崑田金质夫裘叔度夏日小集露台得雨字》。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李开先还专门写有《前象棋歌》和《后象棋歌》这两首专门描写象棋的长诗，清代李绂也写有长诗《象戏限三十韵，局终篇就》。

除此之外，一些象棋棋谱也以诗歌形式描述行棋之法。明代象棋代表作《橘中秘》里就收录有《歌诀》，例如《当头炮诀》：

起炮在中宫，比诸局较雄。  
马常守中卒，士上将防空。  
象要车相护，卒宜左右攻。  
若将炮临敌，马出渡河从。

---

<sup>2</sup> 张如安《中国象棋史》团结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44 页。

这些以诗歌形式写就的对局要领，并无太多的文学价值可言，它们语言通俗直白，具有浓郁的民间俗文化气息。由于这些诗歌较为上口，易于记忆，传播也较为容易。

当然，也有很多描写棋类的诗词，并未言明描写的是围棋还是象棋。有的缺乏相关的背景信息，无法确认是否为象棋诗词。考虑到古人说“棋”常默认是围棋，这些恐怕就不能算作是象棋诗词了。

象棋诗词的大量出现并非是在诗歌兴盛的唐代而是在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这与唐代围棋诗词的大量出现形成强烈的反差，可以说是象棋诗词一个极为特殊的特点。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古代第一“平民社会”，张宏杰先生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中称赞宋代为“平民的盛世”。宋代社会生活的“平民化”特征也影响到了元明清三朝。象棋诗词的这一特点正可说明宋代以后民间如火如荼的象棋活动的影响力，一些文人已经不再矜持于“弈博象贱”的固有思维，开始关注象棋，并从事象棋诗词的创作。

当然，由于“围棋要比象棋更适应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趣味<sup>3</sup>”，“弈博象贱”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的。通算下来，中国古代的象棋诗词总共大约只有几十首，可以说，这个数量是远远少于围棋诗词的。据统计，仅仅宋代陆游一个人所创作的与围棋有关的诗歌数量就有 108 首<sup>4</sup>。比较之下，差距是非常悬殊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古代象棋文化发展的窘境。

## 二、象棋诗词的文化价值

传世的象棋诗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基本全景式地展现了象棋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从这些象棋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象棋发展的基本状况。

古代象棋诗词中写到了精美的对弈棋具。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描写棋具的并不少见，这些诗词大多极力渲染了棋具之美，其中或许不乏有夸张溢美之词。

“白檀象戏小盘平，牙子金书字更明。”宋徽宗赵佶的描写让我们领略了宫廷棋具的奢华。而在其他文人的笔下，象牙制成的棋子也并不少见：“镂牙棋子缕金圆。象盘雅戏，相对小窗前。”在蔡伸的笔下，似乎只有这样的棋具才与小窗对弈的情景完美融合。其他的如吕渭老所说的“檀盘战象，宝局铺棋”，张明中所

<sup>3</sup> 何云波《差异与通融——象棋于围棋之文化比较》，见《中国棋文化峰会文集》广州出版社 2011 年版。

<sup>4</sup> 倪海权《陆游围棋诗略论》，见《中国围棋论丛》第 2 辑第 285 页。

言的“手提楸枰敲暖玉”，以及宋代无名氏的“象戏红牙局，琵琶绿锦绦”。这些关于棋具的描写尽管可能有所夸张，但却是有现实基础的。宋代洪迈在《夷坚志》卷四记载：“乾道初，内侍陈源坐罪谪郴，诏籍其家资出鬻。将作吕义卿得二物：……其一象棋桌，高一尺五寸，阔二尺五寸，空中以贮棋合，四围有阑，牙栅界之，其外用乌木花梨白檀，数匝缘饰，以降真香刻水浪加金填，而浪头填银，芬芴袭人。”

有趣的是，这些关于精美棋具的描写都是宋人的作品，元明清三朝的象棋诗词里几乎找不到类似的内容，这也从侧面证明象棋逐渐在民间普及的情况。

一些象棋诗词还写到了关于象棋史的内容。明代李开先的《后象棋歌》写道：“象戏传流七国时，定名演义周武帝。”而清代李绂的《象戏限三十韵，局终篇就》则说“轩辕始兵制，握胜在中宫。傅会沿周武，规模到小戎。”虽然两人对象棋起源的观点不同，但都认为北周武帝在象棋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清代黄之隽《象戏歌》则干脆将北周武帝视为象棋的发明者：“学者何事不游艺，象戏造于周武帝。”这些诗词可以作为象棋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存世的象棋诗词较少提及对弈的缘起、结果等信息，只有少数作品偶然有感而发，由棋局论及人世。如黄之隽《象戏歌》的结尾感叹：“世间蛮触何营营，蜗角封疆一局纸。”作品化用了《庄子·则阳》篇中“触蛮之争”的典故：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庄子》中这个典故是以蜗牛角上的争执来讥讽世间统治者的争名逐利，黄之隽巧妙地将之引入由象棋而发的感慨，化用得贴切自然而又别有新意。

再如，明代杨慎的《咏棋诗》：“笑度几番局，月白映日红。”写出了超然物外的洒脱。清代袁枚《春日偶吟》：“非常欢喜非常恼，不着棋人总不知。”写出了对局者不足为外人道的甘苦自知。但总的看来，这样由棋而引发的人生感悟在象棋诗词中并不多见，而且表达多较为直接，多限于较浅的层面。这也客观上反映了古代象棋诗词的整体艺术水平。

象棋诗词中也有极少数表现了较高艺术水平，如清代刘墉的《咏象棋》：  
隔河灿烂火茶分，局势方同列阵云。  
一去无还唯卒伍，深藏不出是将军。

冲车驰突诚难御，飞炮凭陵更轶群。

士也翩翩非汗马，也随彼相录忠勤。

全诗虽然并未脱离以棋比附现实的窠臼，但能简明生动，自出机杼。尾联中巧妙地化用宋代刘洙追随文天祥的典故，写棋子中的“相”，暗指“丞相”文天祥，一语双关，不露痕迹而又巧妙贴切。

象棋诗词中的代表性作品的艺术价值决定了象棋诗词艺术水平的最高程度。进行个案分析，有助于对象棋诗词的艺术水准作出正确的判断，避免过分拔高或者过分贬低。但如果跟围棋诗词进行整体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象棋诗词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由于古代有大量的底层劳动人民参与象棋活动，故而一些象棋诗词表现出浓厚的乡野气息。这点与围棋诗词雅致的风格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三、象棋诗词的艺术缺憾

毋庸讳言，中国历史上的象棋诗词不仅在数量远远少于围棋诗词，在艺术水平上也远低于围棋诗词。象棋诗词的艺术缺憾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题材狭窄。各类象棋诗词的内容往往多局限于对棋局本身的描写，至多涉及棋具、对局环境，较少宏大叙事，也缺乏雅人情怀。虽然一些象棋诗词也融入了怀古之幽思，但这些作品尽管纵论古今，却缺少深度。换言之，这些对历史的描写与评论，放在象棋诗词中固然很贴切，放在描写别的艺术形式中也未尝不可。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与象棋相关的典故较少，特别是影响历史大事的更少。试看围棋史，仅仅与谢安棋事有关，即有“赌墅”“焚囊”“折屐”等多个典故。其他如王粲复局、王质烂柯、羊玄保赢棋获封宣城太守等，都能成为文人饶有兴趣的话题，甚至连“商山四皓”这种本来与围棋无关的典故，都能在文人的演绎中与围棋扯上密切的关系<sup>5</sup>。而象棋史上则没有产生这类有影响力的典故，唯一的“橘中之戏”有的版本还将之附会到围棋上。用典，可以使表达更加委婉含蓄，言简而义丰，所谓“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在典故方面，象棋实在是有着先天的不足。甚至，就连象棋的别名都远不如围棋丰富。围棋有众多的别名雅称，如烂柯、坐隐、手谈、乌鹭、河洛、吴图、忘忧、

<sup>5</sup> 刘勰《围棋中的儒道文化精神》，见《知中·宇宙之道就在围棋》卷第76页。

鬼阵……这些别名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诗人进行创作时，可以大大丰富作品的内涵。而象棋基本没有什么有内涵的别名，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古代文人象棋诗词的创作。

其次是意象单一，象棋诗词的意象大多局限于战争相关的意象。这主要是由于象棋文化的历史积淀不足，古代象棋活动较少文人参与，一旦描写到象棋，只能就棋论棋，顶多加上些相关联想。

再次，古代象棋诗词的表现手法大多比较单一，许多象棋诗词常用棋子中的车、马、兵、炮等类比现实生活中的车、马、兵、炮，较缺少新意。

我们先来看宋代程颢《象戏》一诗：

大都博弈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  
车马尚存周战法，偏裨兼备汉宫名。  
中军八面将军重，河外尖斜步卒轻。  
却凭纹楸聊自笑，雄如刘项亦闲争。

诗的颌联中显然是说象棋中的“车”和“马”等棋子的行棋方式是对周代战车与战马的模拟。而颈联中的“将军”与“步卒”，不仅写出了棋子的走法与现实的联系，“重”与“轻”更是一语双关地借棋喻事。

如果单独只看这样一首诗，和前文所提到的刘墉的诗一样，可以说这是一首构思精妙、意象生动、极有艺术水准的咏物诗。然而如果从整个象棋史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象棋诗词的表达方式与此基本大同小异。

我们试看明代的三首同题诗作：

二国争强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  
马行曲路争先道，将守深宫戒远征。  
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  
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成功见太平。

——朱高炽《咏象棋》

两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  
十里封疆驰铁马，一川波浪动金兵。  
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旌旗逼楚成。  
兴尽计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残枰。

——曾荣《咏象棋》

两国争雄动战争，不劳金鼓便兴兵。  
马行二步鸿沟渡，将守三宫细柳营。  
摆阵出战挡要路，隔城飞炮破重城。  
帷幄士响多机变，一卒成功见太平。

——毛伯温《咏象棋》

三首诗中都写到了“马”，并都将棋子中的“马”联系了现实中的战马。甚至，毛伯温诗中的“将守三宫”“隔城飞炮”基本就是朱高炽诗中“将守深宫”与“隔河飞炮”的翻版，而“二国争强各用兵”“两君对敌立双营”“两国争雄动战争”除了语言稍有差异之外，表意基本雷同。

此外，由于古代从事象棋活动的文人数量极少，故而象棋很难像围棋那样成为文人交流、唱和、赠别的工具。因此，以象棋活动为内容的诗词无法像围棋诗词那样大量涌现。

结语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就连原本人类有着巨大优势的围棋都已经无法单纯靠技术作为支撑，早就被电脑远远超越的象棋要想继续保持持久的魅力，就必须深入开发其文化价值。深入分析象棋诗词的文化意义，并对象棋诗词在象棋赛事、文化宣传上的实用价值作探索研究，对弘扬象棋艺术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张如安《中国象棋史》，团结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  
朱南铎《中国象棋史丛考》，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李松福《象棋史话》，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张超英《古代中国象棋棋具》，百家出版社 2003 年版  
刘斌 倪海权《唐宋文人与围棋》，杭州出版社 2017 年版